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爱国主义教育丛书

信息时代与民族复兴 3



信息时代与民族复兴

第一章无法回避的事实

历史的路在我们脚下延伸。

无论我们对过去的历史怀着多么眷恋和自豪的心情，历史悄悄的步履，终究已将今日的中国人推到了这样一个位置——面临着来自现实和观念的挑战。而在迎新挑战的时刻，我们更深切地感受到所面对无法回避的事实。

第一节落后的农业国

中国一向以农立国，中华文明是在农业经济的土壤中生长发育的农业文明。农业经济发展早、比重大，这是传统经济的特点。据《国语·周语上》载：西周末周宣王废除籍礼时，卿士虢文公就指出：“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聚）睦于是乎兴，财用蕃庶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可见农业生产对于当时社会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然而，崇农抑商、重本轻末思想也由此而严重起来。所以，以农为主的经济特征给中国的历史打上了鲜明的烙印。

的确，农业的兴盛，给早期的文明带来了兴盛的必要条件。世界上的古文明莫不如此，如印度文明（恒河流域），埃及文明（尼罗河流域），巴比伦文明（两河流域）及中国文明（黄河长江流域）都是依靠大河两岸的平原地区发展起来的。发达的水系，肥沃平坦的土地以及适宜的气候条件，是农业也是古文明兴盛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但是，农业文明并不具有永恒的优势，以生产工具为标度的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终于在18世纪后半叶迎来了新文明的曙光——工业文明，并迅即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这样描写道——

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整批警批产业军的统领，现代生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愈是扩展，资产阶级也愈是发展，愈是增加自己的资本，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

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是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¹这与20世纪迈着蹒跚的脚步而妄自尊大的农业国形成强烈的反差。终于，“未化”的“外夷”用“奇技淫巧”打开了古老的“中央之国”的大门，于是乎爱国志士们为之震惊、为之呐喊，但慢节奏与高速度的戏剧性场面仍在继续，20世纪中叶，一场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蓬勃兴起，人类迎来了信息时代的曙光。不仅传统

¹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2、256页。

工业得到实质性的改造，发达国家的农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20 世纪后半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生产基本上已由手工操作过渡到用机器操作，并实行了生产过程的机械化。水利建设工程已广泛铺开，广泛采用了生物化学、种子培育、生物技术、遗传工程、电子计算机技术等技术工艺。此外还广泛使用了宇航部门所提供的劳务。进入 80 年代，美国以及西欧国家的拖拉机、康拜因、挤乳机等总台数已“饱和”，出现第二代和第三代农业机械，而电子计算机在农业中的应用则是科技进步的重要标志。据估测，在 90 年代，美国近 3/4 的农产品将是在使用电子计算机的情况下生产的，目前在英国、德国等国家，农业部门使用电子计算机已很普遍，从而使农业生产，尤其是大型农场有了更多的机会获取关于销售市场的情报和信息。科技成果在工具、作物品种、病虫害防治、管理等方面的运用，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和效益。

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农业生产无疑是十分落后的。首先，农业机械化程度太低。虽然，从 50 年代以来，拖拉机、抽水机等农业机械逐步在我国农村推广、使用，但人拉肩扛、畜力耕作乃广泛存在，锄镰镢铧、箩筐扁担仍在农业生产中唱主角，大量存在的是小规模分散经营、原始的手工作业。毛泽东在 1949 年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中国还有大约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落后的，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其次，农民文化水平低，观念陈旧。相当一部分农民处于文盲半文盲状态。这样就限制了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推广和应用。而且，农业科技人员奇缺，据统计当时全国平均 6000 亩耕地、3200 个农业人口才有一名科技人员。再次，农业生产管理落后，小规模分散经营，随意性、盲目性很大，商品意识差，信息闭塞。甚至丰年出现“丰灾”，出现仓容危机、保管危机、流通危机，致使农产品销不出、调不动、存不下。最后一点，生产效率低。直到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70 年代末，我国农业人口仍占全国总人口的 80.6%，平均每个劳动力生产的粮食不到世界水平的一半。庞大的农业人口数量，农业生产大军本身就说明我国在 20 世纪的今天仍是一个落后于工业文明的农业国。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不仅存在“10 亿人口 8 亿搞饭”吃的局面，而且相当一部分农民自己还养活不了自己。落后地区、贫困县人均年收入只有几十元，一百几十元。经过 10 年改革，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温饱问题已得到解决，但农业的落后面貌并未得到彻底改观，离美国那种“3% 的美国人生产 120% 美国所需要的粮食”的状况还相差很远。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实现农业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小规模分散经营向大规模集体化经营的转化，走科技兴农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农业。

第二节科学技术的差距

《毛泽东选集》第 2 版，第 1430—1431 页。

约翰·奈斯比特《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第 36 页。

参照系对于机械运动的质量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参照系在认识上的地位又何止于此。比如当今的中国人，在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经济、科技方面的对比时，不是给那种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夜郎”心态的人浇了一盆冷水吗？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写了一本书——《日本名列第一——对于美国的教训》。有人问傅，你的“日本人名列第一”不是要令日本人举国若狂吗？傅说你错了。日本知识分子批评说哈佛教授为什么故意不评论我们的弊病？国会议员甚至认为这是美国人的阴谋！傅还说：日本人的成功诀窍，最根本的一条，就是他们数十年来举国上下始终保持着最强烈的“忧患意识”——时时刻刻恐惧自己会在国际竞争的夹缝中落伍。这对于当今的中国是有启发的。一位外国学者写道：“当欧洲还笼罩在黑暗的阴霾之中，中国的官员就已经精神抖擞，乘着装有指南针的轻便马车，到各地去参观装置着固体燃料的探空火箭的一些天文研究中心。一千年之后，欧洲科学家在发动工业革命时，中国官僚却还在迈着固定的方步。相形之下，他们已经不那么精力充沛了。”

这些年来，我们对悠久历史、灿烂文化的回顾；对志士仁人、革命英烈不屈不挠斗争的追忆和颂扬，对近代落伍的反思，对我国目前经济、科技、教育状况的审视，正是要唤起全体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危机意识、忧患意识，唤起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振兴中华的热情。

电视片《迎接挑战》在谈到中国近代的落伍和西方文明在近代的崛起的时候说——

中国高举文明的火炬，进入封建社会。但是，当东方的巨狮愚盲目地试图仍旧保持它那帝王之尊的时候，近代科学技术在西方迅速兴起。文艺复兴为前奏，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为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摇旗呐喊。科学战胜了神明，意大利成为世界科学和文化的中心。

英国的崛起，法国的繁荣，德国的强大，美国的魔术，日本的奇迹……悠悠岁月，千古兴衰的历史，这面公允而又无情的镜子，铭刻着过去，照耀着现在，更展示着未来。

她给人以告诫：我们落后了，落后是要挨打的。电视片《迎接挑战》在谈到当今世界新技术革命浪潮及其对中国的挑战的时候说——

20世纪中叶，是科学大变革的时代，人类在天体演化、生命起源、基本粒子三大科学前沿不懈探索；人类伴随着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海洋、空间这六大科学群体技术的呱呱坠地、综合发展，进入了崭新的信息时代。

面对空前的机会和挑战，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不约而同地用危机感、紧迫感激发人们去奋斗、去竞争，去开拓国家、民族、部门企业的发展道路。

新技术革命凝聚着新文明、新浪潮席卷全球，也叩击着中国的大门。

从50年代至今，我们有过翻身解放的欢乐，有过当家作主的豪情，也有过春光融融、车轮滚滚、马蹄踏踏的年华。但是，曾几何时，共和国的巨轮偏离了航线，终于酿成了那不堪回首的史无前例的岁月，灭顶的大灾难、历史的大倒退。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坐失了又一次跻身于世界文明之林的大好时机。

差距，巨大的差距使我们感到切肤之痛。我国有 80% 的农业人口，而美国只有 3%；尽管我国铁路不断延伸，仍只是美国的六分之一、苏联的三分之一。每百人拥有电话台数，瑞典为 83 台，美国为 79 台，亚洲平均近 3 台，我国只有 0.5 台。

建国 40 年来，尤其是改革 10 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粮、棉、肉等生活用品，原煤、钢、发电量、水泥、化纤产品等能源和原材料产量居世界前列，有 10 多种轻工业品居世界前列；而且，我国在科技领域也取得了许多重大科技成果，仅改革的 10 年就取得 113 项多，其中有些项目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由于我国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以及由于工作的失误耽误的时间，致使我们在许多科技领域不仅仅是落后于国际水平，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有相当大的差距。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我们科研投资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科技人员的数量、质量、构成和使用等等方面，都没有理由盲目乐观。

面对席卷全球的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和发达国家经济、科技的发展，我们必须正视我国科学技术落后的现实，下大决心、花大气力急起直追，不然的话，不仅既成事实的差距不能缩短，还会有使差距进一步扩大的危险。在这里，任何盲目乐观、四平八稳、麻木不仁、躺在祖宗功劳簿上睡大觉的想法和做法；失去自信心进取心，自卑自弃心态、怨天尤人心态等等都是要不得的。回顾历史、正视现实，正是要唤起人们的民族忧患意识、历史责任感、紧迫感；增强凝聚力，振奋力量，共同谱写民族历史新的篇章。电视片《迎接挑战》这样写道：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拿破仑曾说过吗：中国，那是一个沉睡的巨人，当他醒来时，他将震撼世界！

第三节 人——数量和素质的困境

一、“人口爆炸”

人口问题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也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对人口迅速增长的忧虑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地球上耕地面积在迅速减少，资源有限而人口在迅速增加。为此，罗马俱乐部以悲观的笔调向人们发出警告。联合国也多次召开政府间的国际人口会议，并把 1987 年 7 月 11 日定为“50 亿人口日”。

如果按照 17% 的增长率计算，世界人口到本世纪末将超过 60 亿，而科学家推算地球最多能养活 80 亿人。联合国预测 2020 年世界人口将达到饱和状态。

当然，世界不同地区、国家的人口状况是不同的，以欧洲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人口呈缓慢增长、停滞甚至下降状态；以非洲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迅速。据联合国人口学年鉴和联合国统计办公室提供的材料，1985 年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最高的国家是非洲的肯尼亚，为 41‰；最低的是欧洲的前联邦德国和匈牙利，为 2‰。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在 60 年代中期一度达到 40‰。人口问题，在我国是一个形势十分严峻的问题。

国际上有个“50 亿人口日”，我国也有个“11 亿人口日”，1989 年 4

月 14 日，中国大陆人口已达 11 亿。建国 40 年，人口翻了一番还要多，中国面临着这样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必须用占世界 7% 的耕地养活占世界 1/5 的人口，而且从中国目前人口的年龄构成来看，继续增长的势头很猛，这说明已经背上的沉重包袱有继续而迅速加大的危险。

旧中国人口发展缓慢，表现为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这与战争频繁、疫病流行、灾荒严重等因素有关。如解放前 109 年人口净增 1 亿 3 千万，年平均自然增长率是比较低的；建国 40 年人口增加近 6 亿人，年平均自然增长率之高令人瞠目；1949 年以后人口状况表现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人民迎来了一个较少战事的和平时期，人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同时，由于经济状况在世界范围内看总体上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消费水平低，人口抚育费用低，家庭出于经济上的动机，有增加人口的需求；由于封建宗教观念、伦理道德观念的影响，相当一部分人有“传宗接代”、“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思想；由于科学文化水平低，缺乏科学的生育知识，不能超出家庭的狭隘眼界从宏观上考虑人口的问题，片面地认为“自己孩子自己养，与别人无关”；还由于对控制人口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以及政治上的错误做法（如批马寅初的人口论）等。

建国以后，我们曾一度认为“人口众多”是一个优势，认为人多好办事。但是，没有人什么事情也办不成，有了人、才能创造奇迹的表述，并不等于说人越多越好。对于这一点，我们有一个逐步加深认识的过程。1953 年，政务院批准修订了《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同时要求卫生部门对人民群众的节育实行指导；1954 年刘少奇召集有关单位座谈节育问题，指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1956 年，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指出：“除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可见，当时国家对人口问题已有所注意，但“赞成”节育和“提倡”计划生育本身，说明对人口问题的严重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后来，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但是，他和其他主张节育的学者的人口观点在 1958 年初受到了批评。1962 年，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贯彻仍停留在“提倡节制生育”的水平（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1964 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办公室，但这一工作由于“文化大革命”而受到干扰破坏。1969 年，周恩来在全国计划生育座谈会上指出：“节育工作一定要抓紧”，“计划生育属于国家计划的范围”。1971 年，国务院批发了《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由于毛泽东的推介、周恩来的努力，各级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成立并开展工作。1973 年起，人口发展列入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了晚婚、晚育，“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具体的要求，即贯彻“晚、稀、少”的原则。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计划生育工作进入新的时期。1980 年 1 月提出“计划生育要采取立法的、行政的、经济的措施，鼓励只生一胎，力争 1980 年把人口增长率降到 10‰ 以内”，9 月又发出《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1982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指示》（即中发〔82〕11 号文件），其典型特点是强调“独孩”，提出即使在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要求生二胎的，也要经过批准进行计划安排。1984 年 4 月，中共中央又下发了“中

发<84>7号文”，在充分肯定计划生育工作取得很大成绩的基础上要求继续大力抓好这项工作，到本世纪末把我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1980年以来，计划生育工作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抓得不紧不稳，并且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经济制裁，人口迅速增长的势头并没有得到持续的控制，致使继1950~1958、1964~1973年这两次人口生育高峰之后，于1986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人口高峰。此间早育、快育、多育现象在广大农村泛滥开来，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虽然我国对城市人口的控制成效显著，基本上实现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但在农村，生孩子在两个以上的大有人在，而且超生现象十分严重，生孩子数在5~9人的农村夫妇屡见不鲜。难怪英国《每日电讯报》1989年4月14日专文《中国的人口大爆炸》说：“去年，农村（指中国——引者注）家庭平均每户的孩子数为4.2个。这一数字令人口学家感到惊恐。”

按照我国年均增长1400万人口计算，如果在1982年人口基础上，使“提倡一胎、控制二胎、杜绝三胎”的政策落到实处，则人口达到11亿的时间将大大推迟。

二、人口素质堪忧

劳动结构状况是衡量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尺度。一个农业劳动者占人口大多数的社会属于农业社会，这样的文明属于农业文明；一个工业劳动者（特别是制造业）占大多数的社会属于工业社会，这样的文明同于工业文明；当从事信息工作的人占总劳动人口一半以上的时候，按生产力、技术社会形态来标度则是进入了信息社会，这样的文明是区别于传统工业文明的现代文明。以信息为代表的现代生产力、现代文明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表现，又是它的必然结果。进入信息时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有电脑参与机器体系对劳动者提出了新的越来越高的要求。正视这一严酷的现实，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作为一个在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严重的人口素质问题。

第一，科学文化知识水平低。

我国企业职工文化素质偏低不说，最严重的是农民文化素质太低。1982年人口普查时，我国有文盲、半文盲（12岁以及12岁以上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2200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23.6%。到1987年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时，下降为20.6%，这5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问题仍十分严重。如此庞大的文盲大军，两亿人存在着摘“文盲帽子”的问题，这与发达国家形成强烈的反差，业已影响了广大农村特别是落后、边远地区经济状况的改观，并具有不容忽视的滞后效应。问题不仅是文盲率高，而且有“文化”的人口还有一个学历与知识水平是否相称，以及不同文化水平的人的比例、结构问题。我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少培养了160万大学生，此间不仅许多学校一度停课、停止招生，而且苟延的几年中也是初中毕业只有小学生水平，高中毕业生还达不到1966年前初中毕业生的水平。大量存在的是小学教师教初中，初中教师教高中；初中毕业教初中，高中毕业教高中（多为民办教师）；而且还要“请进来”（让工人、农民来讲课），“走出去”（让在校学生用大量的时间到农村、工厂去劳动，“接受再教育”），上课时间不如劳动时间多。

80年代的统计资料表明,从总体上看,我国在业人口文化素质偏低,尤其是高等文化率很低(仅为0.9%),高中及高中以上文化率也仅有11.4%,小学文化程度人口与小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将近一半(47.9%),人均受教育5.8年,在业人口平均仅有小学文化程度。而在日本,平均17个人就有一个工程师,加拿大平均20个人一个工程师,保加利亚平均30个人一个工程师,巴西平均100人一个工程师。据统计,1985年中国平均每万人中仅23.11个工程师,是日本的1/270,加拿大的1/231,巴西的1/51,印尼的1/6,印度的1/5。在农业方面,我国农村科技人员奇缺。一个乡镇大小的几十个自然村,上万亩土地,专职科技人员屈指可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0年代早期统计每万个居民中的大学生数,我国在114个国家中居倒数第2位,这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我国幅员辽阔,经济、文化的地区差异很明显。有的局部地区文盲甚至高达70%,儿童入学率低,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条件差。

第二,智力水平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优等种族、劣等种族的说法,但并不否认先天和后天的原因造成人们智力状况的差异性。

19世纪末,英国人类学家高尔顿提出了“优生”的范畴,人们才对人类繁衍中的遗传问题给予了必要的关注。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演进性优生问题尚在探索中,预防性优生则是一个现实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现已知的各种遗传病约4000种,在我国已发现千余种,据1989年2月28日《中国环境报》载:我国新生儿出生缺陷总发生率为12.8%,低智儿总患病率为10.7%,全国有14岁以下痴呆儿340万,畸型儿800~1000万。按我国五类残疾人标准,我国现有残疾人5600万。从先天愚型分布情况看,农村多于城市,落后地区多于发达地区。交通不便的落后边远地区、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环山村镇尤为严重。

提高全国人民的智力水平不仅有一个优生问题,还有一个优生问题,以我国农村为代表,经济条件差和多胎生育制约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大量婴幼儿缺乏良好的物质生活条件,早期教育、智力开发,在广大农村不仅没有引起人们的必要关注,而且通常也不具备必要的条件。

知识和智力的正相关,已为人们所普遍承认。有的学者指出:知识的总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认识能力,解决问题的速度和质量;知识又是创造能力的生长源,知识贫乏就会严重制约人的创造力;知识的深浅、广狭确实影响着人们智力的高低。

三、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

针对人口数量多、素质低的状况,我国制订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落实这一政策应从如下方面入手。

首先,人口多、底子薄——提倡少生。

我国人口多,资源有限,经济落后。人口增长速度不加以控制,后果严重。因此,实行计划生育,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过去我们常以地大物博自傲,但是,不要忽略了,我们不仅曾是第三面积大国(仅次于原苏联、加拿大),同时又是第一人口大国,960万平方公里按11亿人口计算,平均每人只有13亩,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土地面积的1/3,美国的1/4,加拿大

的 1/40，与澳大利亚更是无法相比。我国 14.9 亿亩耕地，平均每人仅占有 1.35 亩，相当于世界人均占有量的 1/3，美国的 1/10，加拿大的 1/20。特别是，建国以来我国耕地面积每年以 80 万亩的速度锐减，而人口却以每年 1400 万的速度迅增。1988 年，我国粮食产量 39401 万吨，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但人均占有量只有 359 公斤，不到世界人均占有量（800 公斤）的 1/2；国民生产总值 13853 亿元，位列世界前 10 名，但人均占有 1260 元人民币，仅相当于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 1/8，发达国家人均占有数的 1/28，在世界各国中排在 100 位之后。根据有关 80 年代初的资料，在我国抚养一个孩子到 16 岁，在农村需 2950 元，城镇 6400 元，大城市 9200 元；从教育费用说，国家花在一个小学生身上的钱为 504 元，中学生为 798 元，大学生为 8000 元；显然，有效地控制人口，有利于资金积累、改善人民生活，有利于就业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尤其是，实现人口增长与经济协调一致，事关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其次，人口基数大，年龄构成刚转为中年型，增长快——提倡晚婚婚育，间隔生育。

我国 30 岁以上的人占全国人口的 60% 以上，每年有 2000 多万人进入婚育期。如果不下最大的决心，采取坚决而又恰当有效的措施，实行计划生育，把人口增长的势头控制住，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给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会带来十分不利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严格控制结婚和生育年龄，做到计划生育。对于符合条件，可生二胎的育龄妇女，也要严格实行间隔生育。

第三，人口素质低——提倡优生优育。

现代生产力和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对人口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劳动者既要有好的体质，又要有较高的智力水平，还必须受过良好的教育。针对这一要求和我国人口素质偏低的情况，必须抓好如下四个环节。

（1）普及优生优育知识，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婚龄育龄青年具备一定的优生优育方面的常识，减少盲目性。（2）把好适婚青年的结合关。防止近亲通婚；了解双方的家族病史、个人病史；进行婚前检查，填写体检登记表，特别是有无生理缺陷，有无遗传性疾病。（3）把好优生关。做到适龄生育，及时进行孕期检查。男女双方或一方有遗传性缺陷的，要对胎儿进行有关的检查，根据遗传规律（显性和隐性遗传发生的几率），争取生一个健康儿童。避免生下先天遗传病显性遗传的儿童。（4）努力做到优育。抓好后天培养工作。一是要抓好早期教育、智力开发，二是在学校教育中使青少年学生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全面发展。

第四节 愚昧、落后的旧思想旧观念

我国目前的现代化建设，迫切需提高人口素质，而人口素质的提高不仅是提高科学文化知识水平，而且要克服旧思想旧观念，消除落后和愚昧。显然，我们工作的着重点是经济建设，要消灭贫穷，但一个文盲充斥，愚昧保守的民族是很难在高科技的现代社会自立自强的，要建立发达的经济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治愚”和“治穷”一样，是十分迫切的问题。这些旧思想旧观念主要表现在：

第一，自我意识、主体意识的蒙昧性。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落后的自给半自给的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此前，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宗法观念浓厚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这是一种严格遵守长幼尊卑秩序的垂直隶属型社会结构。加之统治阶级推行愚民政策，灌输顺民意识，培养其认同和归属感，严重束缚了广大劳动人民个性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群众虽然翻身做了国家的主人，但封建意识、旧习惯势力并没有完全扫地出门。在广大农村，劳动者的文化知识水平很低。因而，相当数量的劳动者还不能通过“反思”确认自己的社会角色，需要形成科学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需要完成由“顺民角色”向“公民角色”的转换，需要正确全面地了解自己的地位和作用、义务和权利，人们对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缺乏热情的参与意识，习惯于迷信和盲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谁当皇帝都一样，反正要种田、吃饭、纳贡粮”的心态，在时下的相当一部分农民中还存在着，这种自在的生存者相对于高科技的现代社会，不异于跃踯在繁华都市中穿绣花鞋镶边裤的小脚女人。如何使他们摆脱愚昧，成为社会主义社会自觉的劳动者，跟上时代的步伐，明确自己的历史地位和责任，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第二，需要层次低、目光短浅，安于现状，胸无大志。

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前身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自给半自给的农业经济，工业很不发达。谋生型的劳动繁重艰辛，生活资料匮乏，大多数家庭菲薄的收入只能开支在生存消费方面，难能顾及文化、教育和娱乐。而且，在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土壤中，往往滋长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心态，主静求稳、害怕竞争，奉行知足常乐的信条。在改革开放形势下，相当一部分农民，尤其是北方农民显然有了致富的政策，却没有致富的勇气，怕担风险，恋土重迁，满足于手工作业方式，满足于没有衣食之忧的生活。由于我们目前经济力量的限制，一些落后地区的人们首先关注的是温饱问题，广大农民关注的主要是衣食之需。发达地区的人们要求吃好一点穿好一点，有了享受的要求和一定的条件。但从整体上说人们常常把目光集中在物质消费生活上，缺乏高层次的需要和动机，讲究实惠，留心眼前是主要的行为取向。有一个顺口溜反映部分农村青年的向往：三间瓦房大大的院，多喂鸡多种菜，一年就是两千块（钱）。姑娘们在一起则谈论：对象送了多少彩礼、多少衣料，父母陪送多少嫁妆。过门之后早分家，抛开公婆，生个胖小子，当家过日子。凡此种种，与新一代知识丰富、眼界开阔、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的青年人形成鲜明对比。

第三，满足于直接经验、轻视科学文化知识。

在我国农业、乡镇企业中，大量存在着手工劳动。农业劳动的作业方式尤为原始，大量使用的是锄镰镢铧、箩筐扁担。这种劳动建立在农民世代相传的经验知识的基础上，在他们看来干农活的庄稼人学习数学、语文、物理、化学、外语没多大用处，“一个大字不识”的人照样是好庄稼“把式”（内行），而且祖祖辈辈、世代代就是这么过来的。上学要花钱花功夫不说，有的孩子上了学反而更不好好种地了。上述观念在农村，特别是在落后边远地区有相当普遍性。进入80年代以来，以沿海发达地区为代表，一部分农民注意到了知识、“学问”的重要性，开始有了让孩子“念书”的要求，而且已经不是满足于“能认识自己（名字）、认识钱、认识粮油票证”，而是希望孩子上“大学”（泛指转移户口，包括上大学、中专、技校等），将来有“出息”（指当工人、进城、当干部）。但是，在社会主义改革中，受商品

经济的冲击，又出现了新问题。部分农民表现出明显的短期意识，致使中小学一度出现严重的辍学现象。大、中专在校学生中的实用主义、个人主义倾向不容忽视，学习动力不足，厌学、消沉、散慢，某些大学生也加入了“经商”的行列，讲实惠、图享受、谈情说爱，没有进取心。在某些条件优越的大城市，一些高中的高材生、尖子生不去报考名气大的高等学府，而偏偏去报考中专、技工学校，把远大的前途，祖国的需要弃之于不顾，目的只是为了毕业后能分在城里。其实，我国许多有理想、有抱负、有眼光的大学毕业生，毕业时放弃留校留城的机会，自愿到适合自己的研究和专业的苦地方穷地方去，结果做出了突出成绩。与之相比，那些不惜牺牲自己的才华和前途来换取城市优越的生活环境的人显得多么渺小，他的选择令人惋惜。

第四，封建迷信还有广泛市场。

时下，不少农民摆脱了贫困，住上了瓦房、楼房，用上了电灯、电话，有了彩电、冰箱，有的还有拖拉机、汽车，但他们却不读书不看报，而是对神鬼佛道、菩萨上帝十分感兴趣，对神灵的崇信超过了科学。甚至一些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大学生，也对求神算命十分相信，每每求助于算命先生，问吉凶祸福，问能否考上大学、能否分配个好单位，是否官运亨通。这里有两个很典型的例子：

算命摊上的文化反差

省司法厅、法院和检察院门前，一个驼背算命先生的生意格外兴隆。记者与他聊起来：“你在这儿摆摊算命，司法人员不干涉？”他的嘴巴朝司法厅一撇说：“那里边也有相信算命的。”“你怎么知道？”

“嗨！昨天有个当官模样的到我跟前，我拉他算命，他半推半就。我对他的前程说了三句话，他点了三次头，掏出10元钱转身就走了。”

“来算命的都是哪些人？”对这个问题，算命先生回答得颇有条理：“有得志的，有失意的，有生祸的。从年龄上看，多是中青年。从文化上看，多是知识分子，里面大学生又占多数。”“大学生相信算命？”“嗨！一点不假。临毕业时来得最多，男生问分配去向前程，女生问对象和命运。”

据了解，算命先生中有退休工人、无业游民和农民。别看他们一般文化不高，可那些文化高的人还就是信。

记者询问了10个算命先生的文化情况，最高程度的仅上过小学四年级。

（摘自1988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稿）

拉“祥林哥”一把

四川长宁县三江乡一位姓周的农民，由于盼生男孩盼不到，悬梁自尽了。

他才40岁。妻子一连生了三个女孩，他急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伦理观残酷地折磨着他。他听说不生男孩与父母的坟地风水有关，先迁了母亲的坟，没起作用。又迁了父亲的坟，还不起作用。第四、第五胎还是女孩。他花钱修了个“朝门”，结果，第六胎还是个女孩。本来已经奔小康的好日子，由于连年迁坟，请风水先生，躲计划生育“打游击”，不仅把多年辛苦积攒的家业花光，还欠了1,000多元债。他实在受不了了。最后，把女儿叫来给他磕了几个头，自己顶上房门，在床上堆了一堆大米，插上蜡烛，点着，上吊了。

他正当年华，正是精力最旺盛的时期，然而，仅仅为了他所不能理解的一种常有的生理现象，竟然撇下还需要靠他供养的一家七口，走上绝路。他死得太没有价值，太愚昧，也太可怜！

这件事再次告诉我们，在我国农村，至今还生活着一些“祥林嫂”、“祥林哥”式的人物。他们的身子虽说已生长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上翻了身，经济上也有了一定改善，但他们的思想观念却依然停留在旧时代，至今没有得到解放，还被封建愚昧的黑暗王国统治着。

应当关心关心这部分深受封建遗毒之害的兄弟姐妹们。帮助他们从旧观念的摧残中解脱出来。不仅关心他们的经济生活，还应关心他们的精神生活。

摘自（1991年3月11日《农民日报》宫伟勋文）

在我国目前的农村，生活一遇不顺心的事，或面临重大选择的当口即去求助于神灵的现象屡见不鲜，年节供神更是比比皆是。所以算命者、神婆、风水先生、雕版套印“灶王爷”、“门神”者生意兴隆。时有因此而闹到倾家荡产（如刚盖好的新瓦房就拆），精神错乱者（没文化的妇女不堪于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恐惧）。还有的大兴土木，修墓立碑。甚至人还没死，墓已修好了。在农村不仅薄养厚葬之风甚盛，而且殡葬仪式中有许许多多封建迷信的东西。旧的一套程式又重新采用而且还要添上新的花样。这些与高科技的现代社会形成强烈的反差，说明我国还面临着清扫封建余孽，提高人们的文化素养，使他们尽快摆脱愚昧的繁重任务。

第五，好人主义，逃避现实，苟且偷安。

儒家“中庸”之道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人们谨言慎行的行为取向。所谓“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而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这种好人主义，逃避现实，苟且偷安的思想在现实生活中仍有表现。遇事从一己小利出发，不顾大局，不坚持原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睁一眼闭一只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知不对，少说为佳。如果不得不说，亦含糊其辞，不偏不倚，不褒不贬，哼哼哈哈，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于是乎，邻人的孩子打架——随他去；国家财产糟踏了——白糟踏；汽车上有人掏钱包——装着看不见；甚至在坏人为非作歹时，有求不应、见死不救。有的身居领导职位不负责任，互相推诿，关键时刻不发言不表态不坚持原则。这种风气滋长，必然是恶人横行无忌，正气压不倒邪气。

第六，平均主义、嫉贤妒能。

在封建时代“均贫富”，“有衣同穿，有食同吃”的思想有其积极意义，但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平均主义观念却是十分有害的。工资要平均，奖金要平均，荣誉要平均，地位要平均。我不干你也别干，你不管我也不管，我不行你也别行，大家捆在一起受穷。

诸如此类的旧思想旧观念，是现实生活中愚昧的、落后的、保守的方面，是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消极力量，必须加以克服。

第五节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由于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没有充分发展的相对落后国家和地区建立的，因而，消灭贫穷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讲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基

《说苑·敬慎》。

《史记·孔子世家》。

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实现由贫穷向富裕的转化，任务更是十分繁重。

落后的基础

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当初马克思恩格斯天才地预见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客观必然性，并估计到无产阶级革命在发达资本主义各国发生。新的社会制度将采取生产资料全社会公有并实行个人消费品按劳动分配；没有商品、货币和阶级差别；有计划分配社会劳动；国家开始消亡。但是，中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没有充分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尽管，这一历史的抉择在当时是中华民族的唯一正确的选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依据。”我们面临的国情就是：建立了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经济上相对落后。

旧中国经济上的落后，主要原因有三：一是腐朽的封建专制统治，窒息了科学技术、商品经济的发展步伐，落后了一个时代。其二，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试图瓜分中国，在侵华战争中掠走了大量的金银财宝、珍贵文物及其他财富。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没落的清王朝就范，既割地又赔款，不仅赔款数额之巨令人瞠目，而且他们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明火执杖地掠取中国的宝贵资源，并把中国当作他们的商品市场。其三，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下，政治腐败，经济衰退。他们逃往台湾时又掠走了大量财富。1948年冬至1949年春，他们从大陆劫到台湾的黄金493万余两、银元1亿几百万元、白银3亿多两，外汇7000多万美元，各种物质装了1500多只船。台湾现有的100家最大的企业中，有21家是原大陆资本。他们无法搬走遗弃在大陆的固定资产仅100多亿元。旧中国在国民党的统治下，货币贬值，物价飞涨。100元法币的购买力，1937年买2头牛，1939年买1头猪，1941年买1袋面粉，1943年买1只鸡，1945年买2个鸡蛋，1946年买1/6块肥皂，1947年买1个煤球。1949年，中国农业总产值只有326亿元（1990年为7382亿元）工业总产值只有140亿元（1990年为23851亿元）。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的报告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10%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的明确的认识和解决，是我党当前的重要任务。”

巨大的差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仅以工农业生产为例，1990年农业总产值是1949年的22.6倍，1990年工业总产值是1949年的170倍，主要农产品和主要工业品都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633页。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430页。

建国 40 年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由于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建设基础差，起步晚，以及一段时期内决策上的失误，因而从目前全世界范围来看，中国依然在穷国之列。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从人均收入方面说，1978 年的统计资料表明，年收入人均 8000 千美元以上的富国有：科威特、瑞士、瑞典、丹麦、联邦德国、美国、加拿大、荷兰、法国、沙特阿拉伯；年收入人均 35000—8000 美元的中等以上国家有：捷克和斯洛伐克、民主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奥地利、匈牙利、西班牙、苏联；年收入人均 800—3500 美元的中等国家有：阿根廷、巴西、希腊、南斯拉夫、墨西哥、南非、南朝鲜、土耳其；年收入人均 400—800 的穷国有：埃及、中国、摩洛哥、尼日利亚、菲律宾、泰国；年收入人均 400 美元以下的最穷国有：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孟加拉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越南、扎伊尔。中国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尤其是农民的脱贫问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而且，地区差异也比较大。从农民人均纯收入方面说。1980 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191.33 元人民币，其中上海为 397.35 元（排第一位），陕西为 142.49 元（排第 27 位）；1986 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 423.76 元人民币，其中上海为 936.57 元（排第一位），甘肃为 269.40 元（排第 29 位）。从发展方面说，据世界银行的一份资料，1955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球总值的 4.7%，而日本只占 2.4%。到了 1980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占全球的 2.5%，日本却占 9.5%。1965 年，中国外贸出口的总额是 22 亿美元，南朝鲜、台湾、香港和新加坡四家出口总额为 22 亿美元；到了 1985 年，中国外贸出口总额为 273 亿美元，而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四家出口总额为 996 亿美元，其中南朝鲜 297 亿美元、台湾 307 亿美元、香港 166 亿美元（另有转口 135 亿元）、新加坡 228 亿美元。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128 个国家中徘徊于倒数 20 位左右，社会发展水平在 124 个国家和地区中居倒数 48 位。而且，我们还有人口激增、土地锐减，资源有限等许多问题要解决。严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再也不能对世界的发展、我们的落后置若罔闻，再也不能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以“革命”代替“生产”那样的错误，面对新的挑战 and 机遇再也不能坐失良机了。

第二章民族复兴的道路

我们曾经先进，但我们不再先进；我们已经落后，但我们不会永远落后，也不允许长久地落后。中华民族用自己的双手书写了自己光辉的历史，这双手也一定能创造更加光辉灿烂的未来。

第一节科学技术现代化

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和我们的战略选择

当前，科学技术发展进入新的时期。电子技术，特别是微电子技术的发展，使传统的生产发生质的变革。过去的工业化主要是用机器代替和节约人们的体力劳动，现在各种各样的微处理机、电子计算机以及正在出现的智能化装备，部分地代替了人们的脑力劳动，提高了某些脑力劳动的效率；生物工程的兴起不仅从根本上改造着农业，而且小生物反应器可能把整个庞大的石油化工企业推出历史舞台；还有激光通信以及一系列新材料、新能源等，都已经从历史的地平线上升起。这些新的科学技术必然要引起一些新产业的兴起，而另一些旧产业被改造或淘汰。人类的生产工具在变化，人类的产业结构在变化，人类的劳动方式和劳动质量也在变化。可以预见这些变化必将创造出空前未有的生产力，其对人类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这种新形势对于中华民族、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既是极好的机会也是严峻的挑战。说它是极好的机会，因为我们可以充分利用世界新的科技成果，改造传统工业，建设现代化农业，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因此，及时把握时机，充分有效地利用良好的外部环境条件，将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的振兴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过去，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错过许多机会。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有长达 10 多年的繁荣时期。日本也利用这个机会，使经济起飞了。有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东欧、南美洲、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等地，也利用这个机会，主要依靠引进外资，搞出口加工，发展起来了。而我国却陷入了“十年动乱”之中，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大好的时机耽误了，拉大了我国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如果我们对世界经济的新形势仍然漠然置之或处理不当，还会使现在的差距更大，把我们甩得更远，到 21 世纪恐怕就有被“开除球籍”的危险。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一场严峻挑战。同时，上述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起飞的经验告诉我们，发展中国家是完全有可能应用最新技术跳过某些传统的发展阶段，跻身于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之列的。

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前些年访问上海时就指出：75 年之后，中国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强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变革中，中国应该充分考虑“第三次浪潮”的特点，在发展一些必要的机器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同时，把重点放在以信息工业为重点的新兴产业上和以微型计算机，连接遗传工程、太阳能、沼气等构成一体的生态农业上去，必将产生重大突破，会迎头赶上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潮流。

面对着世界新技术革命，我们的战略选择是怎样的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洪谈制定我国总体发展的指导思想时说：“生产力的发展道路是否可以有以下几种选择？（1）走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子，即在完成

所谓“第三产业革命”以后再开始所谓“第四次工业革命”，或者说先经过传统工业阶段，再到新兴工业阶段。（2）“迎头赶上”的战略。即在主要方面，甚至一切方面都要超过或赶上发达国家水平。（3）企求一切都立足“自立更生”的战略。不积极采用甚至排斥国际先进技术的应用。（4）不按部就班地走发达国家所走的路子，而是根据我国国情，充分利用现代的有利时机，跳过某些传统工业的发展阶段，直接采用世界上的各种新成果；或者说在我们目前条件下，根据可能采用世界上各种新的适合我们的需要的技术。”

我们认为，我们在选择路子的时候，要注意把外国的实际发展过程和客观规律区分开来。我们绝不能照着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路子去做。既不能采取照抄的战略，也不能采用封闭的战略，而是要结合我们国家的具体国情，采取创新的战略，这就是我们的选择。

首先，一定要看到，当今世界政治的较量，军事的较量，实质上是经济的较量；而政治、军事、经济的较量，关键是科学技术的较量。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综合国力的增强，越来越具决定性作用。哪一个国家拥有雄厚的知识基础，哪一个国家就能够在这次新技术革命中居领先地位。目前国际局势动荡不安，我们能不能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坚定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很重要一点是能不能把经济搞上去。搞好经济建设的关键，又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抓科学技术，实际上就是抓经济、抓政治，其意义是极其重大的。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从1978年到下个世纪中叶分三步走，第一步解决温饱问题已经实现，今后10年我们要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使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到下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当前和今后我们应当做的事情很多，但决定的环节是科技进步。过去10年我们的任务是解决“温饱”问题，经济增长主要靠量的增加，靠扩大生产能力，提高产品产量来满足人们衣、食、住、用的基本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尽管有些质的提高，但量的增加是主要的。今后10年要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由“温饱”达到“小康”，这就不仅需要继续保持产值、产量的稳定增长，更需要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包括优化地区布局和经济结构，提高装备水平和劳动者素质，提高产品质量、劳动生产率和社会经济效益。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说，抓经济工作不抓科学技术就是不得要领，没有抓住要害。在抓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必须把主要精力用在依靠科学技术提高经济整体素质上，要正确处理速度与效益、产量与质量、外延与内涵的关系，这方面谁认识早、行动快、谁就早受益，受大益。因此，我国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大声疾呼“科技兴国”，呼吁人们重视科学技术，利用科学技术来振兴我们中华民族。

鉴于国外的一些成功的经验，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必须走科技兴国之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除此之外，还必须做好经济、教育、科技体制的改革工作，以适应竞争的形势。如果我们还是墨守成规，顽固保守，那么要全面开创新局面，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总之，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挑战，要使我们迎头赶上世界经济、科技发展的新潮流，必须一靠政策、二靠科技。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通过改革，建立有活力、有效率的科研体制，稳定和不断完善促进科技进步的政策，抓紧制定有关的法律和法规。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增加科技的投入，发挥重点科研院所的作用，加强科研单位和科技队伍的建设。积极跟踪世界新技术革命

的进程，努力在生物工程、电子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新型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激光、超导通信等高新技术领域取得新的科技成果，并促进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加快向传统产业的扩散和渗透，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技术开发相结合

进入 80 年代以来，我国制定了依靠科学技术振兴经济的战略思想，并提出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工作要和整个经济建设、社会进步紧密联系，要面向经济，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代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虽然不直接表现为某种技术成果，但它为科技发展开辟道路。如果没有原子物理的研究，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原子弹，也不会有今天的核能源的利用。因此，理论研究为经济发展开辟了道路是很清楚的事情。

第二，许多生产技术问题，我们之所以今天解决得不好，就是由于我们理论工作方面的基础太差。在高新技术领域里，这个问题显得特别明显。不要说生物工程，就是集成电路，由于我们在表面物理、表面化学方面工作的深度不够，这方面的进步也比较缓慢。

第三，很多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对科学的整体研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它并不表现为某一种技术，但对科学的整体发展起重要的作用。数学就是典型的例子。很多数学方面的发展给物理学带来新的境界。

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我们的基础理论研究是不能忽视的。我们要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指导下，一方面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一批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造现有企业，另一方面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根据经济发展的长远需要，开展重点科技攻关，使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变。

本世纪最后几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这一期间，国家要安排一些重点工业性试验项目和企业开发项目、新技术推广项目，继续实施“星火计划”、“火炬计划”，加快重要军工技术向民用转移，推广农产品贮藏与加工技术等。国家还要资助扶持重大基础项目的研究，支持一些有实力的科研单位和优秀科研人才，发挥重点实验室的作用。在某些学科上尽快做出较大的成绩。如果说，我们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保证了第一步战略目标的实现，那么我们把经济建设的重心，进一步转移到依靠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必将保证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胜利实现和现代化的早日到来。我国的“七·五”攻关成果的 80% 已经应用到生产建设中去，能够计算的直接经济效益达 40 亿元以上，“七·五”科技攻关的丰硕成果充分证明了科学技术也是生产力的论断；同时也告诉我们，今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技术开发互相结合起来。

三、传统工业改造与新兴产业开发相结合

今天，传统工业如钢铁、煤炭、电力、纺织等还是我们经济的主体，新

技术产业所占的比重是很小的。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能没有传统工业，但是当前和今后的传统工业不能建立在旧有的技术水平基础上，必须把传统工业转移到新的科技水平基础上来。

我们国家人口众多，生产力发展很不平衡，而且我们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滞后。因此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不能忽视。

加强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采取适宜的投资倾斜政策，少搞一些一般的加工工业，严格控制楼堂馆舍的建设，筹集必要的资金，加强能源、交通、通信、重要原材料以及水利等基础工业与基础设施的建设。在搞好现有企业填平补齐、挖潜改造的同时，有计划地新建、改建和扩建一大批大中型电站、煤矿、油田、铁路和公路干线、港口、机场、通信干线等骨干工程，以及冶金、化工等大中型项目，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

在新技术革命条件下，传统工业不能一如既往，而是要积极吸收新技术新工艺进行有效的改造。

1990年11月13日、16日、19日、2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报评论员的系列文章“论加强企业技术改造”。文章指出：现在，“八五（指第八个五年计划——引者）技术改造的任务已经明确，就是紧紧围绕调整结构，提高经济效益、重点适应三个方面的需要：第一，节约能源，降低原材料消耗；第二，提高产品质量档次，发展名、优、新、特产品和短线产品的生产，增加有效供给；第三，增加出口创汇，并通过消化吸收新技术，使之国产化，实行进口替代，以节约外汇。1990年全国生产工作会议强调“一般加工工业基本上不搞新项目，只搞技术改造，利用现有厂房、人力、物力开发新产品，发展高档次的品种，把现有的生产力充分利用起来”。这是即将施行的“八五”计划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目前我国加工工业摊子铺得大，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简单地压缩加工工业的规模，让一些加工工业企业停产，并不是好办法。积极的办法是通过技术改造使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技术水平上档次，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设备和人力、物力，避免重新出现基建规模过大、经济过热的情况，又可减少能源、原材料的消耗，减轻基础产业的压力，还可以提高加工工业企业的经济效益。技术改造要贯彻国家产业政策。由于历年积累的问题较多，现在我国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失调的状况相当严重。80年代，我国基础工业的比重下降了7.5个百分点，而加工工业上升了10个百分点。全国每年缺电700亿千瓦小时，铁路总运力只能满足货运需要量的65%左右。

因此，我们有必要把传统工业改造，企业技术改造与新兴产业相结合，用先进的技术装备改造传统工业和现有企业，以内涵方式为主，扩大再生产，推进工业和现代化的进程。在能源方面，必须采取一系列政策，积极开发科学技术，来缓解能源紧张的局势。比如，加快火电站的建设，积极开发水电资源，加快石油、天然气勘探，在能源比较缺乏、工业又比较发达的地方发展核能。重视风能地热能 and 太阳能的合理利用，扶植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这些都是缓解能源危机的有效办法。在交通运输方面，除了增加投资、加快交通运输的发展外，还需要各种科学技术的支持，使现在已经有的交通网络，发挥更大的作用，并在以后形成综合协调的交通运输网络，使各种交通工具都能够扬长避短，以适应国民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需要。再具体一点讲，交通运输体系的建设，以增加铁路运输力为重点，同时积极发挥公路、水运、空运等多种运输方式的优势。铁路建设，要采用先进技术对旧线进行改造，

在一些重要线路逐步实现电气化。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不仅要抓好传统工业的技术改造，尤其要把高技术的新兴产业的开发，作为一项战略任务。

从国际环境方面说，本世纪 40 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 70 年代以来，以微电子技术为主导的一批高新技术蓬勃发展，而且产业化进程十分迅速，出现了机械电子工业、光电子工业、办公自动化设备、信息处理系统、电子医疗设备、新能源、新材料、现代生物制品等高技术、新技术产业，与建立在一般技术基础上的传统产业相比，这些新兴产业技术密集、资金密集、经济效益高、其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竞争能力很强。在当今世界，高技术、新技术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大小，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和实力的重要标志。高技术的优势已经成为某些国家的一种威慑力量。

从国内情况而言，我国底子薄、基础差、起步晚、资金有限。教育和科技水平落后的状况的彻底改观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国科技水平落后，生产技术尤其落后，而且科技成果转让上也存在问题，在产品经济条件下，国营大中型企业缺乏吸收高科技成果的原动力，在政策和制度上也需健全和完善。从目前情况看，高技术、新技术产业在我国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小，发展缓慢，已经并越来越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效益的提高。从长远来看，这一状况对发展外向型经济，使我国经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立足并站稳脚跟是十分不利的。进入 90 年代，中国的经济和科技面临新的挑战 and 更为艰巨的任务。

宋健在谈到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的问题时说：中国成立 40 年来，我国已经培养和造就了 1 千多万科技人才，事实证明这是一支有才能有战斗力的队伍。在很多高技术领域，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总的看来，在高技术成果商品化、产业化，使之转化为生产力方面，我们还刚刚开始，还缺乏经验，还面临着十分艰巨的光荣任务。经过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1988 年开始实施了“火炬”计划。这个计划是为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建立和发展这一战略目标服务的。其宗旨是充分发挥我国现有科技优势，创造有利的环境条件，推动国家“七五”科技攻关计划中的高技术、新技术成果；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即“863”计划的成果，其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和技术引进中消化、吸收、创新成果以及科技发明、专利等的开发，形成在国内外市场上具有竞争能力的高技术、新技术产业、产品，推动高技术产品走向国内外市场，带动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提高出口产品的高技术含量，从而大幅度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使我国尽快赶上世界经济发展的步伐。

1987 年起国家计委、国家科委、国防科工委、国家教委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发起和组织了一个研究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研究集体，围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战略、道路、模式、所需的政策环境及高技术产业对社会、经济的深层影响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探讨。1990 年，上述“四委一院”召开 40 余位专家学者等参加的座谈会，总结以往研究成果，分析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研究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探讨 90 年代国民经济与高新技术产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途径。座谈会提出的《关于发展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若干意见》首先指出了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紧迫性和意义，在目前情况下实现中国的经济起飞，必须以高技术的发展作为最有活力的带动力量。座谈会在肯定建国 40 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成就的同时，也指出，我国高技

术产业的发展目前也面临许多问题与困难，主要是：（1）对高技术产业的重要地位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把它作为科技进步的核心内容纳入国民经济建设的总体布局中，使其在调整产业结构过程中发挥带动作用；（2）国家缺乏对高技术产业和其它产业的整体战略与宏观协调，部门、地方自成体系，使本来就十分有限的人力、财力和科技资源严重分散，很难形成整体优势；（3）政策不配套，技术引进没有和国内研究发展、新产品开发等很好结合，相反冲击了科研和高技术产业发展；（4）金融渠道不通畅，已有的若干金融渠道，对象单一，短期行为，再加上条块分割，尚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5）科研与开发、科研与生产、军工与民用都存在脱节，很难形成科研与生产之间在人才、成果、信息、资金等方面畅通转移的局面；（6）缺乏高技术产业需要的人才队伍；（7）至今，我国的大中企业仍然缺乏对科技进步的迫切要求，企业的发展依赖于扩大外延，对研究发展的投入仍然很低。

座谈会强调要根据国情、遵照高技术产业自身规律，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技术产业发展道路。具体地，应关注以下问题。

第一，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要紧紧密结合，相互促进。

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传统产业和基础工业，高技术产业的规模经济的形成也取决于它能否向其他产业扩展和渗透。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的主体仍然是传统工业。国家综合国力的提高，传统工业的改造和升级换代，必须依靠高技术。因此，中央和地方的科学、技术、经济规划、计划必须在这样的高度上达到结合；资源的配置既要体现高技术产业对整个经济发展的先导作用，又要满足使高技术产业与传统产业协调发展的要求。

第二，处理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关系。

国际化是高技术产业的重要特征。高技术产业的主要技术来源、元器件供应和市场都是国际性的。我国近年来的实践表明，对于高技术产业而言，即使是国内竞争，其背后仍然是国际竞争。因此，发展高技术产业一定要面向国际市场，力争在国际范围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产品技术指标及性能价格应以在国际市场中具有竞争力为目标。不同于近年发展迅速的新兴工业国家的是我国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对不同的产业和产品灵活地制订统一的国际、国内市场战略，有利于我国的高技术产业发展，用好大国经济的优势。

第三，高技术产业与地区经济社会的相互依存及双向加强关系。

高技术产业能否在某个地域健康地生长，受地方经济结构、工业基础、技术与经营的支持条件、劳动力素质等多种因素制约；另一方面，高技术产业发展不仅能带动地区的支持性加工与服务，还能带来人才、信息的相对集中，造成产业群的互补与竞争格局，发挥创业精神的示范与刺激作用，进一步刺激新的投资与创业活动。因此，地区需根据自己的优劣势适当地规划包括高技术在内的经济发展战略，形成适合于本地区的产业结构与优先领域。同时，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央企业与所在地区的关系等等，需调整到一个新的水平上。

第四，协调好高技术产业与国防工业的关系。

军民结合，共同促进，协调发展，是世界各国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基本模式。经过40年的建设，我国国防工业已经形成了一个较好的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基础，其中有些技术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严重阻碍了国防工业整体优势的发挥，不利于高技术向其他产业的扩散与渗透，国防工业也未能在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

用。如何走军民结合的道路，利用国防工业已有技术优势和生产基础发展高技术产业，这既关系到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道路的选择，也是在变化了的国际、国内新形势下，国防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出路所在。

座谈会强调要重视制订我国高技术发展的产业战略与技术政策；要建立有利于高技术发展的机制及管理制度；要创造高技术产业发展所需的环境、政策与支撑结构，要充分发挥政府、研究所、高等院校和企业在高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作用。20 世纪的最后几年，对于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1）紧紧围绕解决工农业生产技术和装备现代化问题，特别是为解决农业、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资源综合利用，以及人口控制、生态环境保护和国防建设等方面的重大课题，特别是为了解决农业、水利、能源、交通、通信、原材料、资源综合利用，以及人口控制、生态环境保护和国防建设等方面的重大课题，组织实施科技攻关计划并提供科技保证。（2）加强应用研究，大面积推广投入少、效益好、见效快的科技成果，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水平的提高。（3）积极跟踪世界新技术革命的进程，努力在生物工程、电子信息技术、自动化技术、新型材料、新能源、航空航天、海洋工程、激光、超导、通信等高新技术领域取得新的科技成果。继续推进“火炬”计划的实施，办好高新技术开发区，促进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并加快向传统产业的扩散和渗透，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4）继续加强基础研究，增强科技发展后劲。努力加强重点实验室和专业实验室的建设，提高它们的利用效率。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专业科学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和大型企业的科研工作，密切它们之间的联系和合作。加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密切结合，注意新学科与社会科学的密切结合，注意新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发展。

只要不失时机地抓好科学技术现代化这一关键性工作，就一定能在科技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我国生产力的发展，实现民族复兴。

四、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飞跃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又是以落后的农业为特点的贫穷国家。农业的落后，表现在手工劳动和畜力耕作；不仅作业方式原始，而且生产效率低；在六七十年代不仅总体上农民收入很低，而且地区差异很大，相当一部分农民自己还养不了自己。广大农民文化素质很低，我国的文盲半文盲绝大部分在农村。在这种情况下，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飞跃、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是刻不容缓的、艰巨的任务。

第一，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飞跃，需要有政策上、体制上的保证。在 90 年代，必须继续搞好农村改革工作，提高农业经济的活力。（1）我国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改革，建立家庭分散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济体制，走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富民之路，它兼顾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调动了集体和个人两个方面的积极性，达到了振兴农村经济、摆脱贫穷这一根本目的。今后应保持基本政策的相对稳定，巩固农村改革的成果，稳定中求发展。（2）建立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民在发展农村经济中，遇到许多一家一户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抗旱排涝，植保防病以及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农业开发性生产、农业科技的普及和应用等。在这方面，要充分发挥集体的优势，在政府的统一领导，组织下协

同有关部门、企业、建立高效率的社会化服务体系。(3) 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家庭承包责任制有其优势也有其劣势，比如经济力量、防灾抗灾力量薄弱，机耕机灌等机具设备条件不好利用等等。因此，在乡镇企业、农村副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可在家庭承包的基础上，本着尊重群众意见的原则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从长远的观点看，这是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的必由之路。当然，这种适度规模经营不是退回到过去的集体劳动的农田作业方式中去。而是实现农业劳动力向工副业转移，少量劳动力采用机械化高技术的农业作业方式。(4) 实现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建设现代化大农业，就是要改变占全国2/3的人口搞饭吃的局面。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农民温饱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相当一部分农民仍然是自耕自食，小有盈余；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仅仅是工业产品的商品化，而且要使农产品纳入商品经济中去，实现以商品为目的农业经营。因此，必须大力扶持乡镇企业，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改变单一粮食种植的局面，既种粮食，又种蔬菜，种其他经济作物，还要发展养殖业。随着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米面等主食的需求量将减少，对蔬菜、水果、鱼、肉、蛋、奶的需求量将逐渐增加，这种变化为农村经济的商品化提供了具有美好前景的商品销售市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政策上的保证，需要资金、技术上的支持，需要信息、商品流通渠道的畅通。(5) 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后，要做好农村行政管理体制上的配套改革工作。解决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要改变基层村干部的失落感、无所事事的现象，使农村基层组织在新形势下发挥积极的新作用，使村干部感到有事可做，使各家各户感到村干部必不可少。建立集体与农户的密不可分的联系。要严格保护农民的利益，下大决心杜绝乱收费、乱摊派和化肥农药等乱长价的现象，防止随意克扣紧缺农业用品的供应指标，收购农副产品欠款不还和其他政策、合同不兑现的现象。

第二，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飞跃，要积极增加农业投入，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办成一些大事。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增加新的农业生产能力。具体地，在水利方面，要加强大江大河的治理，有计划地建设一批防洪蓄水、引水的大中型项目，提高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抓紧进行南水北调工程的建设，缓解北方水资源紧缺的矛盾。巩固和完善现有灌溉工程，努力扩大灌溉面积，积极建设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农田；加强农业区域综合开发，建设一批国家级的重点农产品商品生产基地；加强速生丰产用材林、防护林、经济林和薪炭林体系建设，改造生态环境。要进一步发展农用工业，努力增加化肥、农药、农膜、农业机械的供应，并提高他们的使用效益。要积极运用现代生物工程技术培育优良品种。提高农业投资比重，一是要增加计划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二是要增加农业的集体经济积累（如“以工补农”、“以工建农”）；三是要采取多渠道集资方式；四是继续增加农业生产信贷资金，调整贷款投向，优先支持主要农产品商品基地、农业综合开发和农业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扶持农业实用科学技术的推广，五是要制定相应的投资政策，鼓励和引导农民把更多的资金投入农业。

第三，要积极促进乡镇企业健康发展。

对乡镇企业，在政策上要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促使乡镇企业继续健康地发展。乡镇企业是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支柱，也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增加农民的收入和促进农村繁荣具有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

乡镇企业作为一支新崛起的经济力量，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对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不利影响表现在：一是成为全国加工工业过热的重要推动因素；二是其固定资产过快增长扩大了资金、能源、原材料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缺口；三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在地区布局、行业布局等方面有与城市工业趋同现象；四是经济效益不稳，过热的势头一过就会下降甚至倒闭。因此，乡镇企业经济效益低，管理水平落后、产品质量低劣等，必须引起政府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重视。不能因其落后就不予理会，不能任由它自生自灭，而应当依靠科学技术帮助乡镇企业提高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克服盲目性，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保持适宜速度，与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对不同地区的乡镇企业，在发展的方向和速度等方面要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对经济比较落后地区的乡镇企业，要给予更多的扶持；对经济比较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要进一步强调提高经济效益，农业和乡镇企业要互为依托，因地制宜，采取亦工亦农、离土不离乡等多种形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乡镇企业要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利用当地原材料的农副产品加工和建筑材料等工业，在合理规划和开发资源的前提下发展矿业，并发挥劳动密集和传统工艺的优势，努力发展为大工业配套服务的产品和出口创汇产品。

第三，继续抓好科技兴农。欲使我国农业的落后局面从根本上改观，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飞跃，关键的一环是抓好科技兴农工作。农业经济的振兴由过去的强调苦干精神到依靠政策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再到今天把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杠杆放在重要地位，表明我国在农村改革大见成效的前提下及时把握了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脉搏，和捕捉机遇迎头赶上的精神。发达国家的农业在本世纪后半叶基本上已经由手工操作过渡到用机器操作，并实现了生产过程的机械化。水利建设工程已广泛铺开，广泛采用了生物化学、种子培育、生物技术、遗传工程、电子计算机技术等技术工艺。此外，还广泛使用了宇航部门所提供的劳务。今天，美国以及西欧国家某些种类的农业机械器的总台数已达到“饱和”，并已出现第二代第三代的农业机械。电子计算机的使用在英、美、德等国家的农业生产中已很普遍，从而增强了大型农场的力量，有了更多的机会获取关于销售市场等方面的情报和信息。

我国人多地少，农业发展的潜力在于依靠科技进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资源利用的广度和深度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增加产值，提高效益。80年代中期以来，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我国农业开始由“吃饭农业”向以效益为重点的现代农业转化，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比如高产量低效益问题。山东省政府调查组的一份材料表明，山东某市农工商收益之比约为1:3:10，1988年，山东省粮食生产投入产出比为1:2.69，1990年粮食总产创历史最高水平，而投入产出比却下降为1:1.98，影响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村落后面貌的改观。如何实现农业的“高产高效”，无疑是一个必需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通过粮食转化和作物秸秆过腹还田，减少化肥使用量、发展生态农业，无疑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根本途径；再者，要努力提高复种指数，据报道，山东潍坊市1100多万亩耕地，有20%左右达到三作三收，5%左右达到四作四收或五作五收。今有报道，江苏无锡一生态农业专业户，在3分实验地上收获稻谷154.5公斤，售出丝瓜600公斤，连同同时养殖的黄鲜、鲫鱼、田螺，收入超过3000元。最后，要发挥集体优势，以工补农以副养农，采用现代耕作技术，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化，提高效益。天津大邱庄在发展乡

镇企业的基础上增加农业投入，搞农田规模经营，采用机械化作业、引进人才，效益大大提高。另外，积极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对于提高效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比如，我国杂交水稻、玉米以及棉花新品种的推广带来大面积丰产丰收。据有关专家推算，现在科技成果在农产品增产中的作用最多只占（30~40）%，比起发达国家的70%比重差距很大。据测算，全国增加1亿亩杂交水稻，每年就可增加稻谷50亿公斤，杂交玉米如果发展到2.4亿亩，每年可增产玉米120亿公斤。应用模式化综合配套栽培技术，小麦单位面积产量可以增加10%以上。化肥利用率能从30%提高到40%，全国可节约化肥240万吨（折纯），接近现在常年进口量。我国用种量比发达国家多耗40%左右，全国每年粮食用种量约210亿公斤，有节省80亿公斤的潜力，约相当于3000万亩土地的粮食产量。

当此世界科技迅猛发展之际，我们要下大决心、用大气力搞好科技兴农工作，国务院1989年11月关于依靠科技进步振兴农业、加强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工作的决定，国家科委1990年3月召开的全国科技兴农工作会议，1990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对“抓好科技、教育兴农”，推行“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燎原计划”的强调，说明了我国对科技兴农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问题的重视。

近年来，我国实施“星火计划”、“丰收计划”、“燎原计划”已初见成效，并展现了美好的前景。

国家科委关于促进地方经济振兴的“星火计划”的提出，是在1985年，该项计划是在我国着重抓好对国计民生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中长期项目的同时，抓一批针对中小企业特别是乡镇企业有示范和推广意义的、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不显眼”的适用技术项目，以提高中小企业、乡镇企业和农村建设的科学技术水平，为地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植入新的胚胎。国家科委与各地有关部门商讨决定了选择“短平快”项目的五条原则：必须瞄准国内外市场需求；确有资源和技术方面的优势；技术成果商品化周期短，经济效益显著，有可能在一二年投产，5年左右收回资金；具有示范意义，能够为推广应用提供成套成熟技术或提供设备，并可以成为地区培训基地；优先选择那些可以创汇或能减少进口的节汇项目。当时确定的“短平快”项目有24个重点方面，并决定1985年先在山区开发、水产、养殖业、畜牧业和农副产品加工等领域推行实施。

1990年召开的第五次全国星火计划会议指出，当前适合我国国情的、以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为特征的3个层次的科技工作配置格局已基本完成部署。在第一层次上，影响最大的是星火计划。在短短5年中，星火计划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效，给人民带来了实惠，取得了人民的信赖，在全国农村确立了科学技术的地位，大大加速了科技向农村经济扩散的进程。90年代是我国农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相当重要的时期，科技兴农要从广义的大农业思考问题，必须继续在粮、棉、油、菜、糖、肉、禽、蛋、奶、鱼这10个方面和提高乡镇企业产品技术含量上下功夫。要更高地举起“星火”这面旗帜，按照发展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总要求，为农村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合理调整服务。把推动发展规模经营、支柱产业和双层经营作为主要任务，稳扎稳打，在我国农村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中发挥重要作用。

1990年，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星火”办公室提出了《“八五”（第八个五年计划——引者）星火计划实施设想》、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公布了《国家星火奖励办法实施细则》（1990年9月25日）。“八五”星火计划的实施继续坚持振兴农村经济的宗旨，在“七五”的基础上提高水平、扩大规模、促进联合、建立实体、完善服务，向支柱产业、规模经营、双层经营三个方面倾斜，加速“星火燎原”，要遵循的指导原则是：（1）坚持贯彻“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为农村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合理调整服务。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开发新的产品和产业，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内部转移”。（2）继续坚持以科技进步为核心，把提高农村技术水平、管理水平摆在首位。突出资源的综合利用和配套技术开发，为农业和区域综合开发作示范，以引导农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尽快导入科技进步的轨道。（3）因地制宜，突出特色。“八五”星火计划任务和目标的确定要适合当地的资源基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技术消化吸收的实际能力，坚持以先进适用的原则选择技术，逐步向技术密集和劳动密集相结合的高技术开发过渡。（4）加强新产品开发，努力出口创汇，走向国际市场。星火计划要在努力引进、消化国外的先进技术的同时，推出一批具有竞争力、适于国际合作的技术项目、使星火计划走向国际化。（5）启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为“星火燎原”作贡献。星火计划要继续会同社会各界，联合各个部门、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多方面的力量，为振兴农村经济做出成绩。

今后10年，特别是“八五”期间，星火计划以支柱产业和区域开发为重点，引导发展规模经济，为科技兴农和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科技动力。第一，以综合、配套的技术开发为重点，综合开发利用资源，在资源利用的深度和广度方面作出示范。——综合开发利用国土资源。重点研究水面、山地、浅海、滩涂、高原、草地、草场的综合利用，开发适合于不同地形、不同气候和不同资源类型的综合技术，形成多层次、多产业、高效益的农村资源协调开发体系。——加强农副产品的综合加工利用和二次资源的开发，增加资源总量和附加产值，提高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为大田粮棉油作物树立丰产丰收的样板。从资源的深度利用考虑，在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单位投入产出率和降低贮运耗损、提高转化效益上作出示范。第二，推动区域性支柱产业的迅速形成，促进区域综合开发和协调发展。推动区域性支柱产业的发展应注意突出四个方面：首先，应制定切合当地的实际条件，近期可以操作并有长远发展前景的支柱产业发展规划；其次，要把科技进步摆在首要位置，有体现以科技进步为核心的具体内容；再次，要确定为形成支柱产业起龙头作用的骨干企业和科技依托单位；最后，应有可靠的资源基础或资源保证。第三，建立健全科技全程服务体系，推动农村区域支柱产业和双层经营体制的发展。“八五”期间星火计划推动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工作应同发展支柱产业、促进“星火燎原”紧密结合起来，重点发展以龙头企业为骨干的产业集团、具有集体经济性质的技术实体性协会、农业科技综合服务组织等科技服务体系。第四，贯彻“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引导乡镇企业尽快走上依靠科技求发展的轨道。星火计划要着眼于为农业服务，为农村建设服务，继续加强科技支持；建立示范性乡镇企业，引导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开发先进技术装备，提高武装乡镇企业的装备技术水平；培训人才，提高管理水平；引进人才，帮助乡镇企业同科技单位攀亲结眷。第五，“八五”期间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300个区

域性支柱产业和 100 个区域综合开发区及其相应的服务体系，努力完善和发展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要继续开发 100 套先进适用的技术装备；要培训 200 万农村科技管理干部和各种专业技术人员；要安排 100 项商品化前期开发“星火”预备项目；要精选 100 项扩散项目，重点推广，“八五”星火计划的实施本着开拓进取、加强联合的精神，努力创造实施的良好环境，要从实际出发，多渠道增加投入；要安排预备项目，增加星火技术的成熟度和保持后劲；要充分利用现行政策多层次争取优惠支持。

在 90 年代，我国农业要及时把握时代，统筹实施“星火”、“丰收”、“燎原”计划和各种科技开发推广计划，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广辟食物来源；改善城乡居民膳食结构；选育作物、畜禽、水产新品种，建立和完善良种繁育体系；开发高产、优势、高效、低耗农牧渔综合增产技术；区域综合开发治理技术；农产品贮运、加工、包装和综合利用技术；进行农业机械化和农业工程研究、农业应用基础研究、现代农业宏观经济和科学管理研究；抓好微电子技术等新技术在农业上的应用。10 年以后，我国农业将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经济舞台。一个用高科技武装起来的现代化大农业必将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国土上崛起。

第二节 教育和人才

一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高技术的现代社会，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该国的人才状况和教育水平。我国作为一个经济、科技、文化相对的落后的国度，面临的人才和教育方面的问题尤为严重。因此，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事关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和中华民族的兴衰，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不可等闲视之。

一、民族复兴重在人才

社会日益科学化，科学日益社会化是现代社会的—个基本特征。如果说封建社会的生产主要依靠体力和经验，那么现代化大生产则越来越多地依靠智力和知识，越来越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资金和资源怎样运用才能获得最大经济效益，这需要具有现代科技和经营管理知识的各类人才去运筹决策。巨额资金换来的物质装备和设施必须有大量科学技术人才去有效掌握、正确运用、不断创新。可见，人才在新技术革命的条件下，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信息时代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社会化大生产对现代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第一，现代人应具有丰富的科学文化知识，胜任高技术的工作。信息时代的劳动是高技术的劳动，信息时代的人要有能力接受各种不同的载体（文字、图表、音像）传送的信息、并介入到信息系统之中发挥作用（填写表格，使用电话、传呼器，操作电脑）。因此，现代人只有良好的体质是不行的，还必须有丰富的科学文化技术知识。第二，现代人应具有较高的智力水平。在高自动化的信息时代，大量的机械式的、单调的、重复性的简单劳动由机器系统来承担，人们越来越多地从体力劳动、简单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以脑力为主的高级复杂劳动、具有创造性的劳动。因而，劳动者必须具有较高的智力水平，才能胜任高技术的创造性劳动。信息时代不仅对人的智力状况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而且为智能开发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第三，现

代人应有事业心和社会责任感。从狭隘的衣食之需、口肤之欲中解脱出来，有事业心、有理想、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有受尊重的需要，从事创造性活动的需要、成功的需要。第四，现代人应消除自我意识的蒙昧性，能通过对象性的关系反思自身，了解自我生存的地位和作用，权利和义务，意义和价值，扮演适当的社会角色，顺利地实现自律。第五，现代人应有开放的态度，对社会生活有较强的参与意识，善于与人交往并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没有孤独感和逃避交往逃避现实的意向。第六，现代人不能僵化、守旧，要乐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应变能力强，思想和行为能跟上现代发展的步伐。总之，现代人应具有较高的智能和知识水平，有事业心有理想有追求，有健全的人格。当然，信息时代对人的智力和知识的要求是有梯度的。既需要专才又需要通才，既需要高级创造人才，又需要具有一定知识和技能、胜任各种技术性活动的普通劳动者。

在信息时代，缺乏人才是世界性的问题，我国要发展科学技术、振兴经济，人才问题尤为重要。目前，我国不仅需要各种从事高技术研究的科学家，而且需要大量懂技术会管理的企业管理人员，需要大量的农业技术人员、专业信息人员、教师、“公关”人员和高级服务人员。从人才状况上说有如下几个方面要引起注意：第一，人才的数量。我国人才数量少，主要原因是科技基础差、教育落后，而且人才培养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干扰。另外还有个人才分布问题。1990年人口普查各省的统计资料表明，大学程度以上人口超过100万人的省市有北京市、四川省、辽宁省；超过80万人的省市有江苏省、上海市、湖北省、广东省、山东省；人数在10万以下的有海南（8.2万）、宁夏（7.5万）、青海（6.6万）、西藏（1.3万）。其中西藏的数字仅相当于北京市的1.1%。总的布局是南强北弱、东多西少、城乡差异悬殊。人才集中或正在形成的六大中心区有长江三角洲地区、京津唐地区、辽沈地区、山东半岛、珠江三角洲和海南、巴蜀地区。最引人注目的是江南的人才优势和被誉为“金项链”的环渤海经济区（辽沈——京津唐——山东半岛）。第二，人才的质量。我国现有人才不仅数量少，而且还有个质量问题，有的身在重要科研、教育岗位上，有一定的学历，但没有相应的知识水平和研究能力。“文化大革命”期间获得各种学历的人，以及80年代通过各种途径（如函大、职大等）获得大专学历的人中，有一部分人达不到相应的水平。第三，人才的结构。高中级人才比例失调，专业结构也不合理，教育、卫生系统人才较多，技术密集、实用性部门人才缺乏。第四，人才的使用。人才用非所学的问题应引起注意，有一技之长的就要发挥一技之长，业务尖子但不胜任领导工作就不要硬拉来当领导，人才过剩时不要有狭隘本位主义。要为人才跨单位行业使用和兼职提供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第五，人才的人际环境。领导要积极发现人才，大胆使用人才，为人才发挥作用提供方便，要当好伯乐；不要压制人才、不要嫉贤妒能、不要过分苛求，同时还要及时发现和制止嫉妒攀比，互不服气、互相拆台现象，要在全社会形成尊重人才爱护人才的风气。第六，人才老龄化问题也不可忽视。要抓好人才的培养，使我国的人才队伍在稳定中求发展，后继有人。总之，为了适应世界新技术革命的潮流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把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二、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振兴中华

国家强盛和民族振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因此，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和造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急需的各级各类人才和千百万有文化懂技术的劳动者，把发展教育事业放在突出位置，是民族振兴的根本大计，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战略决策。

从教育的功能上来说，教育是人类知识的“遗传”手段，是人类自身生产、劳动力生产的必不可少的环节，是智力开发的重要途径。因此，人的素质的提高，人才的培养都离不开教育。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在高科技的现代社会，教育对科技、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们越来越清醒地看到，智力资源、人才比财富、金钱更重要。在信息时代，国际上的经济竞争、科技竞争、军事竞争，归根结底是智力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谁在教育上、人才上具有优势，谁就取得了经济、科技和军事发展的主动权。否则，就会丧失主动。

从我国教育事业的具体情况看，建国40年，我们逐步加深了对教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人口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从学校人数看，1949年高等学校学生人数只有19.1万人，中等学校315万人，小学5110万人。经过40年的努力，1988年，高等学校学生已达206.6万人，中等学校5246万人，小学42536万人。1990年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97.9%，每百万人口中有大专以上学历者142人；高中文化程度者804人；初中文化程度者2334人。第七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内培养毕业研究生15.8万人，其中获博士学位的6977人，硕士学位的14.1万人。全国文盲半文盲率由1982年的20.37%降为1990年的15.88%。

建国40年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成就是显而易见的，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还存在各方面的问题。第一，我国教育发展起点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问题多，文盲率高，“文化大革命期间又少培养了160万人才。文盲大军的滞后效应，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农村文化状况的落后，各类专门人才的缺乏，已经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第二，我国人口基数大，年龄构成轻，再加上建国后几次人口生育高峰，致使人口迅速膨胀的势头至今未有明显减少。这给教育构成了很大的压力。第三，我国教育人才缺乏，师资力量薄弱，既表现在数量上又表现在质量上。教师队伍质量不高与文化大革命中师资队伍的大规模变化有很大关系。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教师收入偏低，在住房、社会地位等方面有连带反应。师资队伍不太稳定，农村教师有外流现象。第四，职业教育、成人继续教育、打工工作既有一个量的问题，还有一个质的问题，并且须进一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第五，我国经济条件差，校舍及教学设备不足、陈旧，资金短缺，农村教育条件差、问题多。第六，近年来社会上存在着片面追求升学率、追求学历、文凭的现象。第七，一部分人尤其是农民对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农村中小学有辍学现象。第八，学校管理、体制、教材和教学方法上还存在问题，需要加以改革、调整以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从新形势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来说，在当前和今后一定历史时期内，我国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现代化建设，把现在还比较落后的国家建成经济、科学、文化发达的现代化国家。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需要各方面的条件和共同努力，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大量的科学技术人才。而且，为了适应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我国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

高，还必须全面改善全民族的文化素质状况，消除愚昧，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如果我们不从现在起狠抓教育、重视人才培养，不仅会严重影响近中期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而且会延及下个世纪初期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此全国人民特别是领导者们都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切不可掉以轻心，贻误时机。

为了更好地发挥教育在现代化建设、民族复兴中的作用，要重点抓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加深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克服旧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确立正确的教育思想和观念。

信息时代，世界新技术革命使我们面临严峻的形势，国家强盛和民族复兴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因此，我们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大气力狠抓教育，继续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进一步端正办学指导思想，克服旧的教育思想和教育观念。诸如：（1）教育产业观念。教育生产的不是一般的物质产品，直接向社会贡献的也不是货币、利润，而是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劳动者。教育是培养人才、开发智力的重要产业。（2）宏观教育观念。把教育看作一项系统工程，使之与社会化大生产、大经济、大科学相适应。

（3）立体教育观念。视现代教育为网状结构、有纵向层次和横向联系、交叉关系，人才的知识结构适应现代科学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趋势、处理好广博与精深的关系。（4）终身教育观念。把过去的一次性教育发展形成终身教育。（5）开放教育观念。教育应站在社会发展潮流的前头，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力量。教学内容反映人类智慧的新成果，培养学生具有开放观念和开放性活动能力。（6）多样化教学观念。多层次办学，多渠道育人，多学制并存。多种教育方式，多途径筹集教育资金。（7）质量第一观念。（8）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观念。（9）注重发展的观念。（10）创造教育的观念。

（二）增加教育投入，合理使用教育经费。

日本、美国 1984 年人均教育经费 1000 美元，同期我国用于教育的投资 100 多亿元，如果按人均计算，与美日等发达国家相去甚远。按照钱学森对本世纪末我国教育体系的设想，“每年需经费 1000 亿元。比目前增长 10 倍左右。但这是 21 世纪所必需的。”可见，在一个相当时期内，教育经费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我国教育的发展。提高投入不能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拨款，必须调动国内外各方面的积极性，多渠道筹集资金，多途径办学。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加强管理，合理使用。力争用有限的资金办较多的事情，提高资金、设备利用率。

（三）继续深化教育改革，调整和优化教育结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 21 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

教育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于改变我国教育落后的状况和体制上存在的种种弊端，以适应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信息时代的新形势，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需要。首先，要改变教育中以考试为目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片面追求高学历的倾向，把培养人才放在更广阔的视野里进行，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中获得全面发展。其次，要改变呆板的单一灌输式教学方法所造成的教师主宰一切，学

生消极服从，书上怎样写、教师怎样讲、学生怎样记怎样学的状况。把知识传授与智力开发、方法传授结合起来、动脑与动手结合起来，求同与存疑结合起来，搞好双向活动，调动师生两个方面的积极性，采取多种方法进行教学。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性思维能力。再次，改变强求一律的做法，做到因材施教，注意并发展学生的个性，注意有目的的引导和适当的定向培养。使青少年的天赋适时地得到开发。最后，要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面向 21 世纪的教育体系，形成适度的规模、优化的结构、多样化的形式、多梯度的区域布局、开放的系统。要继续加强基础教育，要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各种优秀人才和大批有文化懂技术的劳动者。一定要抓好作为整个教育的基础的基础教育。力争在本世纪末在全国基本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在城镇和经济比较发达的农村地区基本普及初中阶段义务教育，在大城市试行普及高中阶段教育，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重点抓好小学教育，扶持牧区、边远山区，抓好初小教育。重视发展幼儿教育 and 残疾、弱智儿童少年的特殊教育；要进一步改善中等教育，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统筹规划普通高中、中等专业学校、职业高中、技工学校等，调整科类结构，提高教学质量。逐步建立起行业配套、结构合理，与普通教育协调、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事业的重要任务，要根据社会实际需要，合理调整结构，大力提高质量。抓好普通高等院校的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和专业结构，建设一批重点学科，适当发展专科教育，掌握好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规模，继续改革招生和毕业生分配制度，努力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效益。进一步做好博士生培养和出国留学学生工作，促进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要积极发展成人教育。坚持多形式多途径办学，大力开展岗位培训，不断提高企业职工队伍的技术和专业水平，提高广大农民运用农业新技术的能力，要继续整顿并办好成人高等教育，切实提高教育质量。要抓好扫盲工作，争取在本世纪末全国基本上扫除青壮年文盲。

（四）要全面提高教育者的思想道德水平和业务素质，建立适合教育发展的教师队伍。

要提高教师的思想道德水平，教育者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献身精神，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情操，热爱教育事业，教书育人、为人师表。要提高教师的科学文化素质，有扎实的基础知识和相当的专业知识，一定的相关学科知识。要提高教育者的教育知识、教学能力。有一定的教育理论基础，具有较好的表达能力、指导能力、能优化师生关系，并具有一定的教育科研能力、应变能力和预见能力。教育者自身要有敏锐的观察力、良好的记忆力、丰富的想象力，并具有健全的人格。

（五）积极利用现代手段，多途径多方式办学。

在高技术的现代社会，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期刊、计算机网络等现代手段，多途径多方式办学。

第三节心与时代同步

我们要进行现代化建设，振兴中华民族，繁荣社会主义经济，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本身，就意味着实现观念变革，克服旧

思想旧传统旧习惯，使心与时代同步。具体地说要实现如下多方面的转化：

第一，由因循守旧向勇于创新转化。

大一统的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导致了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主静求稳、循古守旧，固执于宗族之法、上古之例，这种向后看的思维取向严重窒息了人的开拓创新精神。在日新月异的现代社会，中国人民必须摆脱陈腐的旧传统观念的束缚。克服思维方法上的形而上学，用运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世界，把握时代的脉搏，跟上时代的潮流，用现代科学文化武装自己的头脑，以开拓者的风貌从事创造性的事业。不要当时代的落伍者，而要当时代的弄潮儿。

第二，由封闭观念向开放观念转化。

传统社会是一种封闭型社会。传统社会的封闭型特征，以乡村生活为代表，人们生活空间狭小、自我封闭、信息闭塞、孤陋寡闻。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少、互动对象少。满足于自给自足，与人交往害怕吃亏，甚至于“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封建统治者一度奉行闭关锁国政策，夜郎自大、鄙视“外夷”，对近代以来飞速发展的西方世界不闻不问，致使中国大大落后于外国而不自知。

在今天我们搞现代化建设，必须正视高科技的现代社会、信息时代的开放性特征，正视我国科学技术和经济落后的事实。确立开放观念，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不仅国家，就是每一个部门、企业、单位和个人都要确立开放观念，有开放意识，防止自我封闭。

第三，由“中庸”观念向竞争意识的转化。

这里不是对儒家的“中庸”思想的完全否定，而是反对藏锋隐智，不求有功只求无过、不敢为人先的庸人哲学。所谓“强梁者不得其终，好胜者必遇其敌”、“出头的椽子先烂”、“烦恼皆因强出头”。在这种逃避生活挑战、不求进取的人看来，“众人”是不宜“先”的，“先”了就会令人生妒，成为众矢之的，带来麻烦，所以应“内藏我智、不示人技”，愈是有本事有才学，愈要装傻作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只有这样才能超然于世俗的纷争之外，求得生活的平静，安居乐业。我们认为，这种苟且偷安的处世哲学是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试想，如果人皆如此，国何以治、邦何以兴，现代化大业又如何实现。面对以“竞争”、“进取”、“高节奏”为特征的新时代，我们必须克服狭隘的庸人观念，积极提倡自尊自信、努力进取、勇于竞争、敢为人先的精神，朝气蓬勃地投入到生活中去，追求一种有价值的人生。

第四，由盲目自在向自主自觉转化。

在剥削制度下，广大人民处于异己的社会力量的统治之下，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向人民群众灌输封建纲常伦理，搞愚民政策，培养奴化人格和顺民意识，提倡迷信和盲从，加之人民的科学文化知识水平的限制，不能通过“反思”认识自我的地位和作用、权利和义务，是为盲目的自在的生存者。社会主义国家肯定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教育和引导广大劳动者，形成正确的世界观；通过反思认识自己的主体地位和价值并实现自律，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第五，由低速度慢节奏向高速度快节奏转化。

小农经济的生活习惯是低速度慢节奏，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四平八稳、

慢慢吞吞，办事拖拉、不重效率。而信息时代的特点是高速度快节奏，时间观念强，重效率效益。在这样的时代，如果我们还是像老牛拉车那样迈着蹒跚的四方步，不仅已经存在的差距不能缩小，还有进一步加大的危险。因此，必须唤起全国人民的危机意识，产生必要的紧迫感，确立现代时间观、效益观，力争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振奋精神、急起直追、才能达到预定的目标，尽快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

观念变革是时代的要求，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要求，搞好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是中华民族以新的风貌新的姿态迎接挑战，书写新的历史新的篇章的要求，不可等闲视之。

第四节 消灭贫穷、走向富裕

在经历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痛苦历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人民必须下大决心、用大气力消灭贫穷、走向富裕，尽快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尽管困难重重、任务艰巨，但我们自信能够做到这一点。

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下大气力发展生产力、搞经济建设、消灭贫穷、走向富裕，是十分必要的、迫切的，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的，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

首先，不发达社会主义超越了经济形式上的资本主义阶段，但物质生产的工业化、商品化、社会化阶段却是不能超越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打碎了旧上层建筑和旧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就必须及时地把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改变生产落后的状况的工作提到首位。

其次，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人民革命的目的表明，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阶级压迫的剥削，改变劳动者的政治地位和经济状况，摆脱贫困，通过繁荣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生产力，使全体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和提高，走上富裕之路。

再次，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初级”的，主要表现在我们还是贫穷、落后的；实现“初级”向“高级”的飞跃，需要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发展生产力，繁荣社会主义经济，改变落后的状况，摆脱贫穷。而且，“社会主义不是独立的社会形态，它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要实现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为未来社会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

最后，发展生产力、繁荣社会主义经济、消灭贫穷、走向富裕，才能提高社会主义的说服力，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社会主义是继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优越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突出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社会主义不能贫穷，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但是，不发达社会主义恰恰在生产力上相对落后于资本主义，经济上也比较贫困。这就更有必要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尽快摆脱贫穷落后。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长久地停留在不富裕状态，甚至于不能消灭

贫穷，那还有什么说服力呢。”

社会主义国家只有搞好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才能改变贫穷落后状况，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社会主义的说服力，巩固国防、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创造条件。

第五节兴邦强国的保障和途径

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中心。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任务尤为紧迫。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紧紧地围绕着这个中心。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特点是社会生产力相对落后，还没有实现工业化，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程度不高。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竭尽全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富强不起来，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缺乏说服力、吸引力。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摆脱贫困，才能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社会主义的吸引力，才能为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有过这样那样的失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后，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发展生产力。直至到文化大革命中，发展到以“政治”、“革命”代替生产。使我国在经济、科技、教育等许多领域，蒙受巨大的损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正确方针。仅 10 多年就取得了巨大成绩。综合国力大大增加。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87 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 463 元，“七五”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以年均 4.2% 的速度增长。1985 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 1148 元，1990 年达到 2150 元。1978 年，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用为 316 元，1987 年为 916 元。“七五”期间以年均 4.1% 的速度增长。1987 年末城乡居民储蓄额达 3073.3 亿元，比 1978 年增长了 13.6 倍，1990 年年末达到 7034 亿元。人民的食品结构已经向营养型转化。居住条件逐步改善，衣着绚丽多彩。洗衣机、电视机、电冰箱在城镇已普及，录相机、钢琴、高档照相机、摩托车已开始或准备添置，农村近年来也开始置备电视、录音机等家用电器。从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人民的健康状况、营养水平、平均寿命等生活质量水平指标，已接近或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从一个侧面说明重点抓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当然，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我国各地区生活水平发展很不平衡，还存在一些贫困户。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继续搞好改革开放，抓好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才能尽快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振兴中华民族。

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本世纪初期，封建统治已难以延

续，资本主义道路又走不通，中国面临着严峻的选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随着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就自然落在了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组织中国共产党肩上。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在长期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并掌握了国家领导权力；由于我们没收了占全国 80% 的官僚资本，建立了强大的国营经济，为建立公有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又由于人民刚刚摆脱了几千年的剥削和压迫制度，不能接受再建立新的剥削制度，因而中国只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长期探索和实践，其间有成功、也有失误。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方针，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为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经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和十三次代表大会，又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作了进一步阐述，提出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明确了新时期的基本路线。改革 10 多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取得，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结果。

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越走越宽广。只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改革和建设事业才能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建国以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尤其是 70 年代末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内地，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呈现出勃勃生机。现在，我们已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同建国初期相比，主要产品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许多经济指标与世界的差距越来越小，不少产品在国际上已名列前茅。农业方面，近 10 年的平均增长速度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几个国家之一。我国用占世界耕地面积 7.2% 的土地解决了 11 亿多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中国近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没有也不可能办到的。同时，科技、文化、教育、体育、卫生和交通运输各业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所有上述成就的取得，说明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兴旺发达的，共产党的领导也是正确的、成功的。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地位，是在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形成和确立的。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关键时期和我们面临各种机遇和挑战的今天，自觉接受和维护共产党的领导，齐心协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全国人民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三、坚持改革开放

坚持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点。离开了改革开放，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会停滞不前，生产力就不能迅速发展，就谈不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报告指出：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改革开放？就是因为只有这样做，才能进一步解放仍然受到束缚

的生产力，促进生产力迅速发展”。

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

首先，改革是我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

根据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的原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同生产力的发展基本上相适应的，但也存在不适应的环节和方面，从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就需要及时调整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革同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方面和环节。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推行改革、搞活经济，生产力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展现出生机勃勃的新气象。

其次，改革是迎接世界新技术革命挑战的迫切需要。

当前，一场新的技术革命席卷全球，这种世界范围的新技术革命，对我们来说，既是一种机会，又是一种挑战。这就要求我们的体制，具有吸收当代最新科技成果，推动科技进步，创造新的生产力的更加强大的能力。我们旧的僵化的体制，是能利用这个机会，迎接挑战的。为了跟上时代的潮流，甩掉历史的包袱，要求我们深入进行全面的改革。只要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根据本国国情，搞好改革，就一定能在这次新技术革命中走向繁荣和富强。美国兰德公司 1984 年预测说：如果中国能够保持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政策不受干扰，那么，跑得最快的金牌很可能被中国夺得。

再次，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因为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激化，必然导致剧烈的阶级斗争，这种矛盾只有通过社会革命，推翻旧的社会制度，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时期虽然也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但这种矛盾不具有对抗的性质，它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节，使矛盾不断得到解决，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从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因此，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改革。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行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改革 10 余年是我国建国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增长最快，人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这些充分说明，改革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不改革，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国家就没有希望。

对外开放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对外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行的一项基本国策。它贯彻在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和交流的各个领域。10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如同中华腾飞的两翼，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力量。

首先，实行对外开放是各国加快经济现代化的普遍经验。

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在其经济发展中都十分重视对外经济关系，充分利用国际条件，并从中得到显著效益。只有 200 多年历史的美国正是由于实行开放政策，为两次世界大战中外国资本和技术向美国转移创造了条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乘机从战败国广罗技术人才，同时采取鼓励进口的政策，对经济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日本一直把自己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归功于对外开放。南朝鲜、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起飞，很大程度上也依靠了对外经济技术交流。印度是个贫穷落后的大国，通过利用世界银行和外国低息贷款，解决了执行经济发展计划的资金问题，使印度

工业能制造国内所需的 85%的设备，并有成套设备出口；农业也有所发展，并挤出部分粮食出口；在尖端科技领域也有重大进展。事实证明，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谁善于利用国际条件为本国经济服务，谁的经济就发展得快。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在保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求得经济的高速度发展，更谈不上实现现代化。

其次，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使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任何国家和民族闭关自守，关起门来搞建设都是不行的。我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尤其要实行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努力吸收世界文明成果，以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在近代的落后，与闭关自守很有关系。建国以后人家封锁我们，我们对“开放”的必要性也认识不足，对自力更生的理解有片面性，再加上“十年内乱”的干扰破坏，这就使得我们在对外经济交往方面，把自己封闭起来。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关起门来搞建设，不仅原来的差距不能缩小，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危险。

70年代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面临着科学技术落后、资金不足、经营管理经验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少等很多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目前有利的国际条件，面向世界，把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一切别国的好的东西尽可能学习、吸收过来，为我所用，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

再次，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取得了巨大成就。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把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作为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措施，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

第一，扩大了对外贸易，促进了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活跃了国内市场。我国已同 177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关系。对外贸易的扩大，解决了部分工农业产品的销路和国内某些原材料不足的问题，促进了我国工农生产的发展。同时，进口一些必要的消费资料，活跃了国内市场，满足了人民的消费需要。

第二，吸收了大量外资，加强了重点项目和国民经济薄弱环节的建设。全国各地特别是沿海地区，利用我们的优势建立了许多个中外合资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并通过补偿贸易、租赁贸易、来料加工等多种方式利用外资。外资的引进，弥补了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办了若干重要建设项目。

第三，引进了大批先进技术，促进了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提高了企业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引进技术之多以万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具有国际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期水平的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通过引进先进技术、人才和管理经验，促进为我国工业产品质量的提高，加快了产品的升级换代，并逐步打入国际市场。

第四，经济特区的建设，沿海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的开发取得了开拓性的进展，逐步成了我国引进技术、引进管理、引进知识和搞活对外开放的窗口。目前，在我国整个沿海地区，已经形成一条北起大连港，南到海南岛的绵延几千里的对外开放前沿地带，它们在对外开放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此外，通过对外开放，使我们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知识，促进了我国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友好关系，提高了我国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 and 声誉。

第六节 不辱使命

中华民族曾经是世界上先进、兴盛的民族，她率先拉开了人类文明的帷幕，将农业文明推向高峰。19世纪后期，在西方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中，她落伍了。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地探索着民族复兴的道路。时至今日，世界已进入了信息时代，新技术革命来势迅猛。抓住机会、迎接挑战、实现民族复兴，成为中华民族奋斗的主旋律，这一历史使命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肩上。

责无旁贷的使命

我们居住的这个星球开始有了人，便有了中华先民的活动。裹泥挟沙、滚滚而前的黄河塑造了中华民族刻苦耐劳的性格；九曲迴肠、奔流不息的黄河造就了中华民族百折不挠的精神；容纳百川、汇入大海的黄河谱写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当世界上广大地区还处在蒙昧时期，中华民族已进入礼乐制度完备的周代文明。纪元前好几个世纪，中国已走向封建社会，而西方进入封建社会，则是纪元后好几百年的事了。

中华大地堪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在古代我们曾以灿烂的文化雄居于世界的东方。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用他们的双手书写了民族历史上不朽的篇章，如先秦诸子留下的典籍，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古代科技，花团锦簇般的诗词歌赋、书法绘画，还有大量出自劳动人民之手的建筑雕刻、织锦刺绣、陶瓷金玉器皿等等，可谓巧夺天工、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在封建社会末期，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压抑和窒息了人才的成长和使用，科举制度把大量有才华的人引向只知颂五经四书、舞文弄墨、一心冀求登科做官的歧途。重农抑商、轻科学、斥技艺，加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满足于直接经验，从事简单手工操作，缺乏科技发展的经济需求和深刻动力，导致了我国近代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国门打开之际，那些鄙视“四夷”以中央之国自居的达官贵人们面对变化纷呈的西方世界，其惊诧不亚于迈进贾府大门的刘姥姥，一时间茫然不知所措，糊里糊涂就被“夷方”的“奇技淫巧”征服了，于是乎有了割地、赔款、门户开放、五口通商、火烧圆明园、南京大屠杀……列强的铁蹄残踏着这块古老的国土，祖国母亲在呻吟中流着血……

中国的落后是在两种文明较量中的失败。17~19世纪，年轻向上、生机勃勃的工业文明以惊人的速度走上世界历史舞台。大刀长矛和洋枪洋炮一交锋，便立即显示出了它的劣势，中国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但是，中华民族不能永远落后，也决不会永远落后。时代在发展，民族要复兴。作为中华儿女，要有这个民族、这个时代赋予的强烈的使命感，紧迫感。

振奋民族精神

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智慧善良、勤劳勇敢的民族，是一个热爱祖国、酷爱自由的民族，是一个自强不息、奋发图强、不甘落后的民族。然而，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毒害，封闭守旧、安于现状的旧观念、旧意识还盘踞在许多人的头脑中，阻碍着我们事业的发展。我们要振兴中华民族，跟上世界历史前进的步伐，就要振奋民族精神，迎接信息时代的挑战！

中华民族本来是一个善于吸收、善于学习外来优秀文化的民族，中华文化也是一个开放体系。但是，到了近代，因循守旧、故步自封的封建主义思

想排斥、贬低更先进的东西；不愿承认、不敢接受外来的优秀文化。在那些闭目塞听的帝王、朝臣看来，那些“未化”的“四夷”，理所当然地应拜倒在“中央之国”的金銮殿下，三呼万岁。然而，在后起的工业文明面前，中华民族毕竟落伍了。今天，我们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努力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就要理智地反思自己并正确地对待西方文明。社会主义是继资本主义灭亡后建立起来的先进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成果，是社会进步的产物，是全人类共有的文化财富，理应为社会主义国家所继承和利用。只有大胆地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我们的民族才能古老而常新。这是我们付出高昂的代价后得出的结论。

近代的落伍、列强的入侵，在国人的痛苦呻吟中出现了“开眼看世界”，呼吁“师夷长技”的一代学人。“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德先生”、“赛先生”又给老朽陈腐的国度吹进了一缕春风。20世纪中叶，当新技术革命的曙光在地球上升起的时候，中华要崛起，就更必须以开放的眼光看世界，以学习的态度对待外面的世界；就更必须提倡科学精神和民主精神，这是时代的要求。我们倡导科学和科学精神，就要实事求是地审视我们所处的时代、认识我们国家的实情、探索民族复兴的道路，实事求是地确立我们的目标。凡是有利于生产力发展，有利于民族复兴的，我们就赞成、就支持；凡是不利于生产力发展、民族复兴的，我们就反对、就抛弃。有了科学精神，才能更好地发展科学技术，才能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消灭贫穷、兴邦强国。

在社会主义社会，广大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生产资料的主人。社会主义事业是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的主力军。只有把群众发动起来，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改革开放才能成功，现代化大业才能实现。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广大人民主动自觉地、心情舒畅地投身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以主人翁的精神、发挥主人翁的作用，这是我们事业必胜的前提和保障。

书写新的历史、新的篇章

1949年10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重新站起来了，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一代觉醒了的中国人面对中西经济、科技、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强烈反差，无不痛心疾首。我们再也不能愚顽自负、自欺欺人了；再也不能闭目塞听、迈着四方步蹒跚而行了；再也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了；再也不能停留在对屈辱史的悔恨与痛苦中，对自己缺乏信心、陷入自卑而没有勇气自立自强；再也不能热衷于轰轰烈烈的大规模政治运动了。设若我们再不奋起直追，我们民族就会被信息时代的列车远远地甩在后面。

有史以来，我们有为发展经济而含辛茹苦的人，我们有为振兴民族而呕心沥血的人，我们有为争取民族独立而血洒疆场的人，我们有为争取人民自由而坐穿牢狱的人。在今天，抓住机会、迎接挑战、兴邦强国是民族存亡的千秋大业，它需要我们全民族的智慧和力量。我们要直面现实，振奋民族精神，以全新的民族风貌肩负起民族复兴的历史重任。我们有制度的优势，有千千万万满怀热情的现代化建设者。但是，在高科技的现代社会，战争年代那种人海战术已不能奏效，单靠出大力流大汗、拼命精神不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的落后局面，我们要努力缩短与发达国家经济、科技领域的差距，跟上新技术革命的步伐。

在今天，历史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是，发挥我们的优势，不失时机地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提高科技水平，振兴我国经济，实现现代建设的宏伟目标，再展东方巨龙的雄姿。

